

· 巴蜀历史 · 民族 · 考古 · 文化 ·

巴蜀历史 · 民族 · 考古 · 文化 ·



· 巴蜀历史 · 民族 · 考古 · 文化 ·

巴蜀历史 · 民族 ·



· 巴蜀历史 · 民族 ·



巴蜀历史 · 民族 · 考古 · 巴蜀历史 · 民族 · 考古 · 文化 ·



巴蜀历史 · 民族 · 考古

· 巴蜀历史 · 民族 · 考古 · 文化 ·

巴蜀历史 · 民族 · 考古

· 巴蜀历史 · 民族 · 考古 · 文化 ·



李绍明
林 向
徐南洲

主编

巴 蜀

历史 ● 民族 ● 考古 ● 文化

巴蜀書社

22.561

273

1

巴 蜀 历史·民族·考古·文化

李 绍 明 林 向 徐 南 洲 主 编

巴 蜀 书 社

一 九 九 一 · 成 都

56788

责任编辑：栾永平 范 勇

封面设计：张光明

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

李绍明、林向、徐南洲 主编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75 插页1 字数235千

1991年4月第一版

1991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190册

ISBN 7—80523—377—2/K·81

定价：4.30元

目 录

近五十年来巴蜀文化与历史的发现与研究·····	林 向	3
-------------------------	-----	---

历史·民族篇

巴蜀社会性质初探·····	董其祥	23
论三星堆文化居民的族属·····	罗二虎	44
“瞿上”新探·····	庄巨川 林法仁	61
蜀开明族文化性质初探·····	李晓鸥	68
蚕丛氏的南迁·····	范 勇	76
严道賁人考·····	何元灿	84
巴人与土家族·····	李绍明	93
魏晋南北朝的賁人·····	蒙 默	105
鄂西悬棺葬和“巴”、“蛮”·····	张 雄	122
板楯“七姓”与賁人·····	罗开玉	132
巴与土家的民俗比较·····	邓廷良	144

文化·考古篇

从广汉玉器看蜀与商文化的关系·····	李学勤	151
---------------------	-----	-----

茶为古巴蜀语 译音 说	陶元甘	157
巴蜀的青铜器与历史	林 春	164
巴蜀文化的分期和内涵试说	李复华 王家佑	174
巴蜀与西南夷的文化联系	傅正初	186
荆门出土巴蜀铜戈图铭新探	张勋燎	197
从三星堆的新发现看早期蜀文化	宋治民	207
蜀人的墓葬分期	霍 巍 黄 伟	224
天彭阙为古蜀国“观象台”说	徐南洲	239
巴文化与巴族的迁徙	尹盛平	253
涪陵小田溪巴王墓新证	段 渝	269
洪水传说与鳖灵治水	冯广宏	284
成都市区蜀文化遗址的新发现	王 毅	295
长江西陵峡至川东夏商时期文化分析	高应勤 卢德佩	310
三星堆遗址的文化特征	陈显丹 陈德安	320
广汉三星堆考古记略	敖天照 刘雨涛	331
后记	李绍明 林 向 徐南洲	339

目 录

近五十年来巴蜀文化与历史的发现与研究·····	林 向	3
-------------------------	-----	---

历史·民族篇

巴蜀社会性质初探·····	董其祥	23
论三星堆文化居民的族属·····	罗二虎	44
“瞿上”新探·····	庄巨川 林法仁	61
蜀开明族文化性质初探·····	李晓鸥	68
蚕丛氏的南迁·····	范 勇	76
严道賁人考·····	何元灿	84
巴人与土家族·····	李绍明	93
魏晋南北朝的賁人·····	蒙 默	105
鄂西悬棺葬和“巴”、“蛮”·····	张 雄	122
板楯“七姓”与賁人·····	罗开玉	132
巴与土家的民俗比较·····	邓廷良	144

文化·考古篇

从广汉玉器看蜀与商文化的关系·····	李学勤	151
---------------------	-----	-----

茶为古巴蜀语 译音 说	陶元甘	157
巴蜀的青铜器与历史	林 春	164
巴蜀文化的分期和内涵试说	李复华 王家佑	174
巴蜀与西南夷的文化联系	傅正初	186
荆门出土巴蜀铜戈图铭新探	张勋燎	197
从三星堆的新发现看早期蜀文化	宋治民	207
蜀人的墓葬分期	霍 巍 黄 伟	224
天彭阙为古蜀国“观象台”说	徐南洲	239
巴文化与巴族的迁徙	尹盛平	253
涪陵小田溪巴王墓新证	段 渝	269
洪水传说与鳖灵治水	冯广宏	284
成都市区蜀文化遗址的新发现	王 毅	295
长江西陵峡至川东夏商时期文化分析	高应勤 卢德佩	310
三星堆遗址的文化特征	陈显丹 陈德安	320
广汉三星堆考古记略	敖天照 刘雨涛	331
后记	李绍明 林 向 徐南洲	339

近五十年来巴蜀文化与历史的发现与研究

林 向

近年来，巴蜀文化与历史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首先有一系列考古新发现，如广汉三星堆——成都十二桥早期蜀文化遗存的发掘与研究，被认为是“巴蜀文化研究中突破性的重大进展”、“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最惊人的发现”、“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考古发现”等等；其次，巴史的研究因为和湘鄂川黔地区实行自治的土家族的族源探索相结合，成为另一个学术热点；再次，现在有更多研究“巴蜀文化”的学者从书斋走向田野，走向社会，立足学术，着眼未来，批判地继承“巴蜀文化”的精萃，“古为今用”地为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所有这些标志着巴蜀研究已揭开了新的篇章^①。目前这项研究方兴未艾，新课题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近半个世纪来的发现与研究的历程，以清醒地估计现状与展望未来，无疑是会有益的。这里以年序为次，略加评述，谨作献曝之忱，以就正于方家。

三十年代

过去，关于古代的巴蜀仅限于佚史的考述与乡土古迹的著录，可信度甚低。至本世纪三十年代始有用近代方法以治巴蜀史者。

1930年吴致华发表的《古巴蜀考略》^②可视为近代治巴蜀史的早期代表作，基本上根据古籍记载，考证巴、蜀的立国时代、四界疆域、政治消长等。有两点新意：（1）运用国外传入不久的“图腾说”以解释巴、蜀的族名，如“以蛇释巴”、“蜀因蚕得名”；（2）对巴、蜀的社会文化模式作了评价，认为巴蜀同样经历了由游牧向农业定居的转化，殷商时期蜀已有城廓都邑，后来发展的宗庙、饮宴、立太子等都和中原同制。巴的姓氏与诸夏同，有货币、城市、职官和君臣观念等。秦举巴蜀（公元前316年）至西汉文帝是同化剧烈时期。

关于秦灭巴蜀的年代引起了一番讨论^③，因为《史记》的纪、表、传记载各异而有秦惠文王初元九年（公元前329年）与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之争，终以后元之说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关于“因蚕得名”，朱鹮先又倡《古蜀国为蚕国说》。但孙次舟认为，蜀地前无蚕业，不能用图腾来解释，蜀乃中原译音，古蜀国实为夷族之邦，南迁后为叟，与今之彝族有关^④。

学术讨论逐次展开，但引起更多学者对巴蜀研究关注的，还不是文献诠释的分歧，而是地下出土的新证据。

1929年广汉真武宫农民燕道诚挖水沟发现一坑玉石器，有璋、圭、琮、璧、斧等约三、四百件，深夜取藏秘不宜人。后来消息传出，1934年3月华西大学博物馆的美籍学者葛维汉和林名均前往发掘。在沟底与沟岸又获若干玉石器与陶片^⑤，此事引起避

居日本的郭沫若的注意,来信询问。他在1934年7月回信中指出:广汉发现的琮、璧、璋等均与中原出土物相似,证明很早就有文化接触,殷甲有“蜀”,周武王伐纣有蜀参战,陶器很古老,断为周代早期是可靠的。瑞典的安特生认为,广汉出土物与河南仰韶的收藏品极为相似,只是没有彩陶。所以葛维汉在1936年发表的《汉州发掘的最初报告》^⑥把“广汉文化”的上限定在铜石并用时代,下限在周初,并认为能清楚地看到广汉文化与中原新、旧石器时代文化间文化联系与传播的证据。

可见,三十年代取得的成果有:(1)巴蜀的文化传统与中原文化的认同;(2)把广汉的发现与蜀相联系;(3)蜀之国在殷周之际,而历史可上溯到原始社会。

四十年代

巴蜀研究形成第一个高潮,这是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全国学者云集西南,尤以四川为多,“边疆研究”蔚然成风;成都附近出现的“巴蜀铜器”更激起人们的浓厚兴趣。一些著名学者:徐中舒、董作宾、顾颉刚、缪凤林、童书业、郑德坤、卫聚贤、商承祚、陆侃如等都撰文讨论,《说文月刊》在1942年还出了巴蜀文化专号。其中有三件事值得记述:

(1)“巴蜀独立发展说”的提出:顾颉刚的《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⑦从三王五帝,夏禹殷商,到春秋时期列举了十四条文献所载巴蜀与中原的关系,逐条批驳,从辨伪着手,一一否定。如“最有害的是常璩的根据谶纬以叙述巴蜀的古史,罗泌的根据谶纬和道教经典以建立全部古史,杨慎的有意作伪,司马贞的胡乱拉扯,这种态度最要不得”,“扫除尘雾,露出真相”,“真的历史的事实,则只有蚕丛等为蜀王,巴与楚有国际

关系的两点而已”，“古蜀国的文化究竟是独立发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

顾先生的某些论断显然过激了，但是他抱着“没有彻底的破坏，何来合理的建设”的批判精神对后人以很大的启迪。他后来在详细比较了《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中有关蜀的二十二条异同点之后，指出：“杨氏所录固多不经之言，而皆为蜀地真实之神话传说。常氏书雅驯矣，然其事既非民间之口说，亦非旧史之笔录，乃学士文人就神话传说之素地而加以渲染粉饰者”^⑧，真可谓入木三分。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是一元或是多元，自来争执不下，而顾氏所倡的巴蜀与中原各为一发展序列之说，确为真知灼见，不断为后来的发现与研究所证实。

(2)“巴蜀文化”的提出。过去四川出过一些与中原不尽相同的青铜器，流布海内外，未为人识，或生误解，如被认为是“夏器”^⑨。抗战中，成都西北桥附近白马寺坛君庙出土的一批铜兵器和罍、壶、罍于等，落入古董商手，（或说白马寺有古旧货市场，出土地点不详），卫聚贤收集后著文《巴蜀文化》^⑩，认为兵器可分直刺、横刺、勾击三大类，花纹有手心、龙、人、饕餮、蛇、蛙、鱼等；罍于上还有虎、方云挟日、船载旗鸟、云上有鱼等纹饰。巴蜀为秦灭前已有文字，坛君庙可能是古蜀国宗庙所在地，蜀读若“竹”，为中原译音。铜器的断代自商末至战国。广汉的蜀文化只见玉、石、陶器，现在看到“巴蜀文化”的精美铜器了。但是，卫说一出即引起争论，当时学者大都持怀疑态度。

商承祚认为：成都白马寺不应出商周铜器，应该是洛阳的白

马寺，铜器锈色与河南出土者相同；卫文所列的铜器中有伪器13件、文字后刻者7件，嵌金器肯定系伪作；其余的铜质优劣不一，非一地所出^⑩。当年限于认识，怀疑无可厚非，指出内有伪作也是对的，但全盘否定巴蜀青铜器的存在，甚至于怀疑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也非蜀人作品，为西周器物被人带之入川，显然不妥。不过，当年怀疑论者有代表性，如郑德坤在论述巴蜀古史时，也不把这批青铜器列为“巴蜀文化”的^⑪。

有的学者从历史地理角度提出质疑。关于殷商甲骨文中的蜀，胡厚宣认为当在今山东泰安到汶上一带。董作宾认为蜀在陕南，并不在成都。童书业认为巴蜀本汉水上游之国，后为秦楚所迫而南迁入川^⑫。

成都附近有无“巴蜀文化”遗物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当然不成为问题，而在当年却很少有学者支持^⑬。不过“巴蜀文化”一辞从此为学术界所采用。

(3)川西大石文化的发现。冯汉骥、庄学本对成都平原及川西山地作考古调查，发现墓石、独石、列石遗迹多处。如成都的“石笋”、“石镜”、“五块石”、“五丁担”等都与蜀王的传说有关。其年代自新石器时代以至周代。被认为是“秦代未入巴蜀以前的遗物”^⑭，这一点倒为多数学者所接受。

要之，这些研究中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课题：(1)巴蜀文化系统的归属；(2)古代巴蜀的地理位置；(3)文献记载巴蜀古史的可靠性；(4)巴蜀遗物的辨认与断代等。可惜限于当时条件，这些基础性问题都未能深入下去，而有待于社会的安定和地下证据的更多发现。

五十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因而有大量的地下文物的出土。巴蜀考古在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徐中舒等的领导下,进行科学的发掘,出土文物的价值远非过去的零星盗掘所能比拟,从而把巴蜀研究引向深入。比较重要的有四大发现:

(1)船棺葬的发现。1954年昭化宝轮院墓葬群因宝成铁路修建工程而被发现,同时在巴县冬笋坝因砖瓦厂取土也发现同样的墓葬群,两地均出土巴蜀铜器,其中有30座土坑墓是用独木舟形葬具,尸体与随葬品收殓在挖成的船舱内,也有在舱内另置木棺而成船槨的,当时都以“船棺葬”命名之,一直沿用至今。随葬的铜兵器有柳叶形剑、空首斧钺(俗称烟荷包式),三角援戈、本上有翼遮阑的有胡戈、长铍双耳矛、铍等;铜容器有釜、甑、釜、壶、盘等;铜器及印章上有手心、虎等花纹(被认为是巴蜀符号)均与四十年代“巴蜀文化”青铜器相同。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以绳纹球形罐(俗称人头罐)、器盖状矮圈足豆为主,也有釜、壶、盘、盆等。时代约当秦举巴蜀前后至西汉初年,被认为“与战国时期的巴人应有一定的关系^⑥”。船棺葬的发掘,从地下证明了“巴蜀文化”的存在,虽然这个命名以后又遇到新的挑战,但作为一个学术认识过程是有很高价值的。

(2)羊子山土台遗址的清理。1953—1956年在成都北郊羊子山配合砖厂取土清理了一座土台遗址,残高10米,底边约103.7米见方,三级四方形,每级用土坯砖砌墙作边,中间填土夯实。台基下曾清理石英岩卵石打制的石片石器五件,土台填土中有小平底罐、高把豆、浅腹(尖底)盘陶片和石璧残片,与广汉真武宫出土相同。当时认为是东西周之间的遗迹,可能与蜀王杜宇建国有关^⑦。土台废弃后入葬的墓已清理211座,年代从战国至明清,

构成一部蜀地墓葬编年史，可惜仅刊布个别墓葬资料。现在，经研究，羊子山土台“可能是商代始建”的古蜀国巫觋通天地的神坛^⑧。

(3)水观音遗址的发掘。1957—1958年在新繁（今新都）水观音发掘了遗址和墓葬。遗址文化层厚25—80厘米，陶器以夹砂粗陶为主，器形有小平底罐（钵）、高把豆、盃（鬻？）、尖底罐、圜底罐、圈足簋等。文化层上部出铜镞及铜饰物；下部有灶坑等。早期墓葬被压在文化层下，只出少量陶器，如小平底罐；晚期墓葬打破文化层，以尖底罐、圜底罐等围成墓圻，出土铜器有直援戈、三角援戈、长铍矛、空首斧、削等。遗址出土物与广汉同，而晚期墓葬的铜戈与二里岗殷墓及黄陂水库出土物相似，故当时简报推断：早期墓为商代，遗址为商末周初，晚期墓葬为西周至春秋^⑨。现在来看除晚期墓葬不会晚至春秋外，断代正确，这就为早期蜀文化与战国的巴蜀文化的衔接，提供了地层堆积的文化序列。可惜至今未见正式报告。

(4)铜器窖藏的发现。1959年在彭县竹瓦街发现一处窖藏，在大陶缸中盛着21件青铜器，计容器8件（五罍、一尊、二觶），兵器13件（八戈、一戟、二钺、一矛、一铍）。铜器断代在殷末周初。其中“覃父癸”、“牧正父己”两觶被认为是殷人之物，为蜀人参加伐纣之役所获，证实了《尚书·牧誓》所记蜀为信史。其余铜器的铸造特点既有殷周文化因素，又表现自身特征^⑩，更进一步证实巴蜀青铜器的年代是可以早至殷商的。

考古新发现激发了学者对巴蜀研究的积极性，竞相著文讨论。徐中舒的《巴蜀文化初论》^⑪是一篇里程碑式的论著，他把文献、考古、民族三种资料与方法融合起来，全面讨论了巴蜀的

经济、文化、历史、族属与文字。指出古代巴蜀是一个经济文化区，但并非孤立，水观音出土的铜兵器证明“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船棺葬是为秦戍蜀的巴族遗迹；巴文与么些文（东巴文）有一定亲属关系，而分支较早，晋代南中“夷经”即其一脉相承的文字等等。

蒙文通的《巴蜀史的问题》^②是另一篇重要论著。他从巴蜀的地理疆域、民族成份、文化传统、经济中心的转移等方面着手提出一些影响很大的论点，如《汉书·地理志》所载“与巴蜀同俗”的地区，实际上就是巴蜀文化圈的范围；古代巴蜀境内有上百个大小古国，巴与蜀不过是其中之一；蚕丛、鱼凫、杜宇、开明各为一族，后来迁至成都平原，经过治水，农业发达；蜀文化先于楚，在文翁兴学前已甚发达，是祖国古代文明中心之一等等。

潘光旦的《湘西北土家与古代巴人》^③是又一篇影响较大的著作。他提出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后裔”的论点，虽因种种原因，诋毁者有之。但是土家族的族源中有古代巴人的成份则是真知灼见，近来被愈来愈多的人所接受。

综观五十年代（尤其是前几年），巴蜀研究以科学的考古发掘为基础，以文献、考古、民族三结合开展综合研究，发表了一批里程碑式的重要论著，为今后的考古工作与科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六十年代

当时尽管学术研究遇到了困难，但巴蜀研究还是没有中断，例如1960年川大考古教研室顶着困难调查了广汉真武宫——月亮湾——三星堆遗址的范围与内涵^④。1963年与省文博部门共同在

月亮湾进行了发掘，从地层上证明该遗址有相当于商代的下层与西周早期的上层相叠压的关系。可惜发掘报告至今未能见刊。

冯汉骥的《关于楚公蒙戈的真伪并略论四川巴蜀时期的兵器》^②一文，从考古类型学上把“蜀戈”分为五式，并判定其年自殷周之际到战国时期，后来虽因新资料可加修正，但基本论断可从，成为蜀戈断代的重要依据。

《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在1960年出版，为巴蜀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科学资料，引起历史考古界的重视，同时开展了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田野报告的编写方法问题的讨论^③。

徐中舒又发表了《巴蜀文化续论》^④，对中国历史上的宗、里、邑、都、溪、峒、阴、阳；氐、羌、蛮、僚、狄等等，作了独辟蹊径的论述。广征博引地阐述这样的论点：“巴蜀虽然仅限于祖国一隅，但是它与祖国其它部份仍然息息相关，就在远古时代亦不例外。”

蒙文通的《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⑤，分析了《山海经》一书所载：人物世系、事物起源、天文历法乃至计算方法都不同于中原文化传统，而是南方文化系统的代表。论证《海内经》是西周中期以前的蜀国作品；《大荒经》是西周晚期以前的巴国作品；《五藏山经》《海外经》则是接受了巴蜀文化影响后的楚国作品，写成年代较晚，公元前602—360年之间。提出：“《山海经》就可能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古籍。”

巴蜀青铜器的研究，对四川之外地区所发现被认为是“伪作”的异形铜器的重新认识起了作用。如长沙收集的“楚公蒙戈”，上海旧藏的“蔡邝果戈”，湖北荆门出土的铜戚（戈），

都引起了热烈讨论。于省吾、姚孝遂、沈之瑜、马承源、俞伟超、张忠培、高至喜等纷纷就这些“异形戈”（实为蜀式戈）的真伪、族属、流传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②，这在六十年代沉寂的史学领域里有相当大的影响。

七十年代

十年动乱之中，考古文物工作率先复苏，1972年首先在涪陵小田溪发掘清理了三座巴族墓葬，以后陆续在成都、郫县、简阳、犍为、峨边等地^③清理发掘了一批巴蜀墓葬与窖藏，收集不少巴蜀铜器。

涪陵小田溪清理的三座土坑木椁墓比较重要，出土各种精美的巴蜀铜器等文物200多件，被认为是巴国上层人物的墓葬^④。其中M1出土的一套错金铜编钟14件；M2出土的虎纽铎于；M3出土的长胡四穿的铭文戈尤其重要。徐中舒研究了虎纽铎于后指出：铎于本是中原乐器，传入巴国后成为其文化特征之一，铎于与钲乃军中号令之物，且钲上有两个“王”字，可见M2的墓主人很可能是巴部族众多小王中的一个。邓少琴研究了编钟后认为：涪陵错金编钟14枚，基本成套完整，正合七音的倍数，可能为音域中之中音部与高音部两部音阶所组成，这种天子、诸侯所用的礼器出在巴族贵族墓中，值得注意。于豪亮考释了M3出土的长胡四穿刃内戈的铭文后认为：从形制到铭文均为秦器无疑，秦灭巴蜀后秦王在位过廿六年的只有惠、昭与始皇帝三人，前两王时蜀守为张若，并不名“武”，此戈只可能是秦始皇廿六年戈，从而把此墓的断代在秦统一之后^⑤。

1977年周原凤雏西周宫殿基址发现的周初甲骨卜辞中有“伐蜀”记载，不仅展示了与殷商卜辞中形体结构均为不同的另一个